



政法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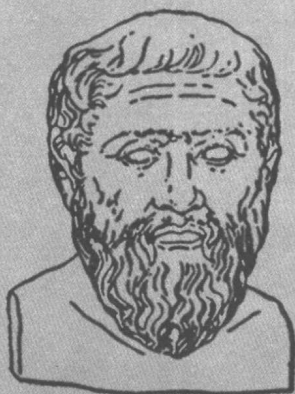


政治家

——论君王的技艺

(古希腊)柏拉图 著 黄克剑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政治家

——论君王的技艺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黄克剑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家: 论君王的技艺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黄克剑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771-9

I. 政... II. ①柏... ②黄...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347) —文集②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20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1835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4.5 印张 2 插页 112 千字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9.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幼獅文化書系

目 录

再版序	(1)
译序：寻求虚灵的真实	(7)
政治家——论君王的技艺(逻辑上的)	(25)
附录一：柏拉图和他的著作	(129)
附录二：《政治家篇》提要	(137)
英汉译名对照表	(139)

再 版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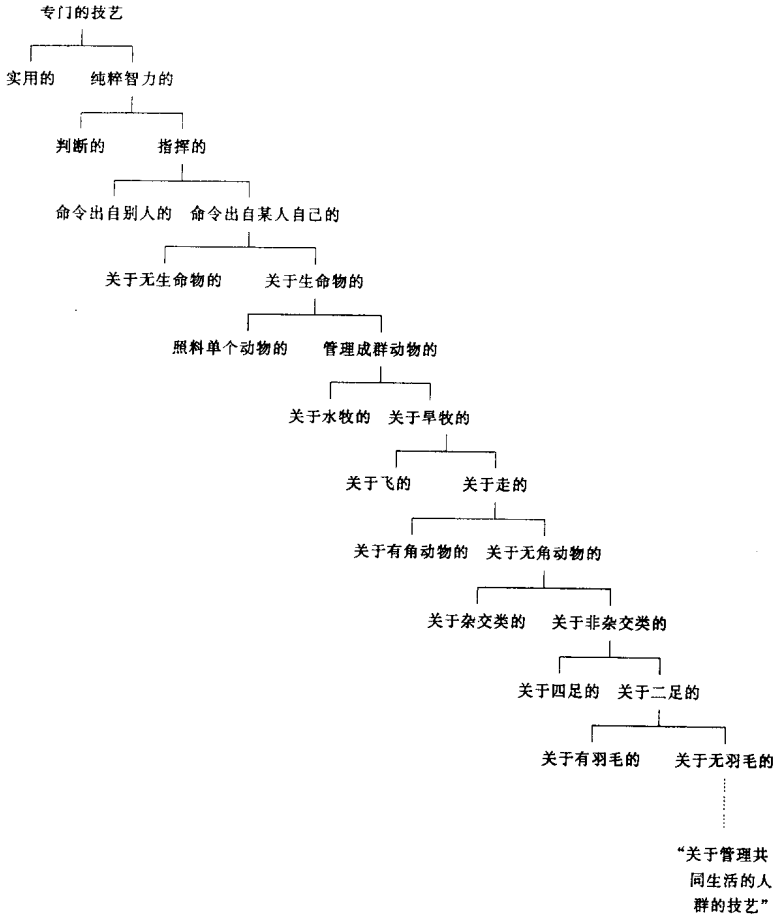
八年前的初春，我着手译柏拉图的对话体著述《政治家》。尽管这篇文字的重心如其标题所示在于“政治”，而我当时真正对它发生兴趣却是因为那在对话中被当作散逸的题外话演述的“哲学”。当我在这里同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庸”(Medium)范畴相遇时，一种意外而真切的灵觉油然而生。像是蓄聚了许久而渴望燃烧的柴薪撞到了一颗火星，寻路而行的神思在又一次遭逢的幽晦中再度赢得一缕光的烛引。借着“中庸”，我找到了一条洞达“理念”的捷径，它印证了先前我对“理念”出于价值祈求的猜测，也使我就此比勘于孔子的“中庸”之道，闪电般地领悟到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类哲训的微旨。这份让我时时回味的学缘亲切而默然，它曾吐露在我为译文的初次出版所写序言的如是话语中：“在《政治家》中，由对话过程长短的讨论带出了所谓‘中的标准’或‘中庸’的话题，这对于‘政治家的技艺’说来的题外话，在柏拉图的思想遗产中有着比论主关于政治家技艺的全部结论乃至他用于界说这技艺的二分的方法更重要的价值。它是‘如实’慧从‘方便’之门的透出，借着这一束光的导向，我们可以指望沿着一条能够避免太多歧误的通道进到那幽眇而奇诡的‘理念’世界”。

然而,《政治家》的主题毕竟归落在“政治”和“政治家”上。值此译文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之际,我愿就柏拉图意想中的政治技艺略做申说以补初版译序所述之不足。

柏拉图心目中的治国之术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它不是权力的仆役,反倒是权力必得受它的节制而为其所用。它被认为独立于当下权力的拥有者;正因为这样,它才可能作为一门不为权力拥有者的意志所屈的学问被探究。“一个具有这种(治国)技艺的人,不管他碰巧是统治者还是平民,他的这种技艺是否都应该被恰当地称做‘国王的’?”当问题被提到这一度时,柏拉图让对话者毫不含糊地回答:“至少,他有权利要求这样。”(下文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政治家》——引者)“国王的”正可谓“政治家的”,这里只是以其称述治理国家所当有的那种技艺的属性。如此被论说的“君王的技艺”,是对现实政局中既已居于王位的经验个人的超越。它自始即是批判性的,既用以批判“由选举或抽签”裁处诸政治事宜的那种民主制,也用以批判君主制下尸居其位或逞意而为的君主。《政治家》有一副标题,即“论君王的技艺(逻辑上的)”。这所论“君王的技艺”不是从诸多经验的君王治国之术抽象而得的“共相”;它诚然是“逻辑上的”,但其“逻辑”内在地涵贯了属望于理想的政治家的价值祈求。

“君王的技艺”或“政治家的技艺”的外延是以对“专门的技艺”连续“二分”的方式愈益切近地界定的,而“二分”的一个确然的分际在于尽分于二的两部分必须同时是两个独立的“种”。划出“政治家的技艺”的领域是一个冗长而须得从容理会的过程,在初版序言对其理路做了大致勾勒后这里有必要以如下的图表对其措思线索做一扼要提示:

再版序



在“二分”的每一层阶中，被接置不顾的“种”(图表中所有列于左方的项)对“政治家的技艺”做遮诠的限定都有着绝对的意义，如谓“政治家的技艺”不是“实用的”或不是“关于无生命物”的管理的、不是“照料单个动物的”等。相比之下，每一次二分被保留下来用以表诠“政治家的技艺”的“种”(图表中所有列于右方的项)，其对被界说的对象却都是意义尚不够确切而有待再做限定的，如谓“政治家的技艺”是“纯粹智力的或管理群居动物(人包括其中)的”等。倘把连续“二分”的被保留项(图表右方的项)连缀在一起以逐层上溯地做一种限定，可得到关于“政治家的技艺”的一个相对确定的外延性的定义，如谓“政治家的技艺”是管理“无羽毛的”、“二足的”、“非杂交的”、“无角的”、“行走的”、“群居动物”而“命令出自某人自己的”、“指挥的”、“纯粹智力的”专门技艺。但如此下定义，永远只能不断接近被定义者，却难以全然命中其对象。在外延的轮廓渐次趋于清晰而大体可辨后，内涵的赋予便成了必要的点睛之笔。线性的逻辑语言的不堪迫使柏拉图诉诸比喻以申达“政治家的技艺”的旨归，于是在蜿蜒的思路伸到尽头时，他把他所喻说的“专门的技艺”归结为使“勇敢”的人的品格和“节制”的人的品格和谐交织的那种“编织”的智慧。

柏拉图并未就“政治家的技艺”对“中的标准”(中庸)的默守说更多的话，但他对任何一种专门技艺必有其“中的标准”的强调显然触发于顾念中的“政治家的技艺”。依他的逻辑，“政治家的技艺”成其为“政治家的技艺”不在于某些政治家或君王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一专门的技艺依其“中的标准”有其理想的范型。这范型也可谓“理念”。与《理想国》相比，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没有对国家的理想形态做任何描绘，他只把它了解为由理念意义上的“政治家的技艺”所治理的国家。正像《理想国》不曾

为人们承诺国家的理念在世俗国度的终将实现,《政治家》也没有为人们做出理念意味的“政治家的技艺”必当被某位君王或政治家所拥有的承诺。他由“政治家的技艺”的“理念”祈想着一个由这理念境地的技艺所治理的合于“理念”的国家,但在把这样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推定为“完美无缺的政体形式”时,他也出于现实可能的考虑而认可以法制为契机的“第二好的国家”。依法律的有无,“可见的”国家政体被柏拉图分为六种,此即所谓“王政”(有法律的君主政体)、“暴政”(无法律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有法律的少数人的统治)、寡头政体(无法律的少数人的统治)、有法律的民主政体、无法律的民主政体。六种政体作为对“完美无缺的政体形式”——所谓第七种政体——的摹仿,最有可能成为“第二好”的国家政体的是“王政”(有法律的君主政体)。柏拉图对法律的优长与缺陷的剖析是深刻而富于启示性的,法制——由此才可能引生“第二好”的国家政体——的不得已而行在他那里是因着这样的逻辑:“照目前的情形看,像我们所称述的,在我们的国家中还无从产生这样的国王——他像蜂群中蜜蜂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就天生卓越而适合为王,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聚集起来制定成文的法律,以仿效完美而真正的政体形式。”

柏拉图终其一生不曾淡漠政治,但这份与政治的不解之缘是根于哲学家的“善的理念”这一终极眷注的。与“中庸”或“中的标准”的确立相应,政治从此成为一种有着专门技艺和独立价值的学问。无论柏拉图就政治和政治家所说的那些话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遭到怎样的诘难,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是,政治和政治家的技艺在它最初的界说者或祈想者那里却不曾沾染任何机心与权术。世俗的政治也许是人类社会蒙受历史尘垢最重而最不干净的领域,但献祭在这里的鲜血和牺牲却也滋养着从未

政治家

消歇的人间“正义”的价值。柏拉图是最早从政治和政治家的技艺中觅求“正义”价值的哲人,而且这觅求对于不脱功利干系的政治始终葆有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单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每当被弄得肮脏不堪的政治在重新选择一块可奠基其上的净土时,这位《政治家》的作者何以总会被人们再度记起。

克剑

2001年9月11日

于北京西郊

又及,值本书付印之际,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共乐教授对书中所涉希腊文字进行了认真校订,并纠正了上次版本中即存有的希腊文字错谬。在此,谨向杨教授表示谢忱!

译序：寻求虚灵的真实

知识·智慧·生命

1. 涵淹智慧的知识是真知，寓托生命的智慧是神慧。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之光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

不论以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比拟东方的孔孟如何地不相宜，至少，有一点却是这些“轴心时代”的哲人们所共备的：他们诉诸本真的生命，在人类心灵的空濛的童年做一种人生应然趣向的贞辨，并缘此把内在的承诺以口头或文字的方式做某种勉为其难的表诠。但既然是关涉灵魂的归置对“克己”、“立人”的向度有所肯认，言诠便不得不取佛家所谓的“分别说”，而既然是“十字打开”式的“分别说”，说者便无论如何也无法画出一个意味上的没有把柄的圆。

读柏拉图或者正像读孔孟一样，需要有“得意忘象”的功夫；文字最表层的“知识”对于为知识输入活力的“智慧”原只是一种“象”，同样，涌动在智慧中的“生命”才是智慧的真正的“意”。文字中寓着哲人的灵魂，它须得当下的运思者的灵魂去呼唤。对于那些认定古哲的灵魂早就死去的人说来，那灵魂果然是死了；对于那些确信那灵魂就在意境的“灯火阑珊处”的人说来，它竟

或就会在你“蓦然回首”的刹那如期而至。神的契入是决定性的，但同一个有深度的灵魂交往必要有与之相称的灵魂的深度，否则，解剖灵魂同解剖被灵魂遗弃的尸体并无二致。

2. 人们当然有理由对柏拉图在《政治家》——一篇难读而又颇有代表性的对话——中就国家政体所说的许多话做措词激切的批评。例如，他说：“在与其他政体形式相比较的时候，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所有方面都是软弱的，无论是在好的方面或在坏的方面，它都无法有所作为，因为在这种形式中，政府的权力按小份额分给了许多人；因此在所有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不好的，在所有没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下文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于《政治家》——引者。）至少，人们可以这样提出诘难：既然代表民意的法律被认为是社会治制中终究不可或缺的，那么还有什么政体比民主政体更能保证法律所体现的公正不被亵渎呢？同样，人们可以用同一个理由反驳柏拉图对所谓“有法律的君主政体”所做的“居冠的或最好的”赞许，因为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在一个权威的君主——集中了所有权力因而可能使政府有着极高“效率”的君主——面前，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法律的权威，而从这里正好可以窥见“有法律的君主政体”的内在扞格。

3. 甚至，柏拉图在经由思路的多重跌宕后就政治家的技艺所得出的华美约言式的结论，似乎也完全不值一顾了。他以“编织”的技艺喻示人们：“当着国王的技艺借助友谊和思想感情的一致把上述两种人（节制的人和勇敢的人——引者注）引入共同的生活时，一件所有织物中最壮丽、最美好的织物就完满地织成了。这件织物把国家中的所有居民——不但是自由民，而且还有奴隶——归置其中，由它把他们联成一体，统治并保护他们，而不遗漏应该属于一个幸福之国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已经有

人指出：“把政治比做纺织艺术是柏拉图的一大创造，也可以说近代和现代的把国家比做机械装置和机器的做法，就是对柏拉图创造的翻版。”（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5页。）而我们当然可以更确切地以下述方式对那“最壮丽最美好的织物”提出质疑：每个个人的最优秀的品质既然只不过是国王的政治编织技艺所必要的经线或纬线，那末，所有被“归置其中”的个人是否还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独立性和个性？

4. 然而，把柏拉图的上述提法归结为一种牵系着某种终极眷注的价值教化，也许比执定为一种政治学说更妥切些。正像对同一篇对话中柏拉图不厌其长地引述的天体逆向运转和随之发生的过程回溯的神话故事，我们与其把它看做是对人类历史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探源究底，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寻趣到神人之际的价值导引。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的心神所注或可说是在于文化所必要的虚灵的精神支点的贞定；他同他终生敬仰的老师一样，不是那种诉诸一定组织形态的宗教的创教者，但对人生态度做某种根本指点而论，他和他的老师所做的却都是立“教”的事。诚如佛教，究宣真元的“如实”慧并不排斥决断行止之疑的“方便”慧，柏拉图也做系属于当下事功的政治、法律设计，但“方便”之门的开启总在统之有宗的“如实”的根本慧的烛临下。

因此，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方便”意义上的正误的纠结，而当是对于生发于“如实”处的智慧的体识。“方便”既然不过是“方便”，我们便仍可以依“方便”的态度松开过多的执著，把灵思集中到对象的生命智慧的真正在所。宗教的真谛无从衡以知解理性的尺度，相通的理致是，对于立“教”者柏拉图所觅求的虚灵的命意，我们不能绳之以所谓实证的政治或历史科学。

同一与二分

5. 比起柏拉图在涉及事功的“方便”层次上那些缘于种种制约而注定带着更多局限的结论性话题来,推绎的方法显然有着更普遍的价值。在界说政治家技艺的迂回思路中,最富于启示意味的是“同一”原则与“二分”方法的相即相成。全部的逻辑线索系于一个托底的概念,政治家对国家的治理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的技艺”。柏拉图是从“专门的技艺”开始纵贯式的一系列“二分”的;随着外延的几何级数般地缩小,是被界说的对象的内涵的成比例的丰满:“专门的技艺”被分为“实用的技艺”和“纯粹智力的技艺”,“纯粹智力的技艺”被分为“判断的技艺”和“指挥的技艺”,“指挥的技艺”又被分为命令“出自别人”的指挥技艺和命令“出自某人自己”的指挥技艺,而命令“出自某人自己”的指挥技艺再被分为发布与“无生命物”相关的命令的技艺和发布与“生命物”相关的命令的技艺,于是,由发布与“生命物”相关的命令的技艺引出了动物的饲养、照管或管理;接着,发布与“生命物”相关的命令的技艺——亦即照管动物的技艺——被分为“照管单个动物”的技艺和“成群动物的共同照管”的技艺,“成群动物的共同照管”的技艺被分为“水牧的技艺”和“旱牧的技艺”,“旱牧的技艺”被分为“飞的动物的管理”的技艺和“走的动物的管理”的技艺,“走的动物的管理”的技艺被分为管理“有角动物”的技艺和管理“无角动物”的技艺,管理“无角动物”的技艺被分为管理“杂交类”动物的技艺和管理“非杂交类”动物的技艺,管理“非杂交类”动物的技艺又被分为管理“四足的非杂交类”动物的技艺和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类”动物的技艺,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类”动物的技艺再被分为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有羽

毛的”动物的技艺和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无羽毛的”动物的技艺,由此,一个最初的、还需继续界定的政治家的技艺的定义产生了,这即是所谓“管理有生命的人类的技艺”或所谓“某种管理共同生活的人群的技艺”。

6.“专门的技艺”在层阶有序的二分中相继被分出那些与政治家的技艺不相干的部分,同时,政治家的技艺也因此而获得愈来愈细密的规定。随着“实用的技艺”、“判断的技艺”、命令“出自别人”的指挥技艺……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有羽毛的动物”的技艺的被排除,政治家的专门技艺被步步深进地做着“纯粹智力的”、“指挥的”、命令“出自某人自己”的……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无羽毛的动物”的阐说。这期间,逻辑的同一律是纵贯每一次二分的。最初,为柏拉图所选定的“专门的技艺”的概念在每一层的二分中都被保留了下来,在专门的技艺被分为“实用的”和“纯粹智力的”两部分后,“纯粹智力的”在此后的二分中又都被保留了下来;依次类推,所有被保留下来的概念在逐次限定中组成的有序系列,恰是对所探求的政治家的技艺的逼近。所以,依柏拉图的理路,政治家的技艺的定义也可做如下的表述: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无羽毛的”动物的……命令“出自某人自己”的指挥的纯粹智力的技艺。恪守同一律以“属”加“种”差的方式为事物下定义,是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通则,柏拉图在政治家的技艺的推绎中对此做了最好的演示。

7. 二分的过多的层阶使趣向政治家技艺的路径宛转而漫长,但这与其说是柏拉图的刻意编排,不如说恰恰是由于措思者的顺其自然。任何一次二分都没有人为的刀劈斧凿的痕迹,它所体现的是使二分有一个确然的分际而不致落于划分者的念愿的原则:被分而为二的两部分必须同时是两个“种”。在柏拉图看来,种与部分的差异分外要紧:“任何事物的一个种,都必定是

这一事物的一个部分；但反过来说，它的一个部分却未必也一定是一个种。“男人”和“女人”分别是“人”的一个种，而又是在能把“人”尽分于二的两个部分；“雅典人”与非雅典人——雅典人心目中的“野蛮人”——或可看做“人”的两个部分，但至少非雅典人并不能构成使“人”尽分于二的一个种。不顾及“种”的自然界线的二分不是真正的二分，柏拉图的“二分”是依据同一律为事物下定义并因此而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中心环节，它的是否依“种”（“属”）相判从逻辑上直接决定了诉诸种属关系的定义是否有效。

在独具一格的中国语言传统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式的句型。“仁者人也”，“天者巛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类语式似乎是在为“仁”、“天”、“性”、“道”、“教”下定义，但细细品玩，却与定义并不相干。“仁者人也”只是对“仁”做一种所谓“人成其为人”的指点，“天命之谓性”也只是对“性”做一种所谓“天之所命”的启示。敏慧的人也许能从这“仁”与“人”、“性”与“命”的指点或启示中悟出极深长的意味，而神思终于不能进入的人却可能因着这里没有确定的致思的脚手架可供攀援而一无所获。在事物的某种意味被心灵肯认后，表达这肯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既成传统的东方传说方式和西方传说方式或者并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判分，但没有疑问的是，我们看得出柏拉图的思维和表诠方式曾怎样影响了整个西方的传统。

8. 在最初由一系列“二分”所达到的政治家的技艺的定义中，柏拉图并不轻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但在他那里，有些环节被分外看重，而且显然，管理“二足的非杂交的无羽毛的”动物并不就是通向政治家技艺的“二分”道路的最后一段路程。他指出：“如果管理无角动物的技艺的一部分（政治家技艺的这部分